

读懂百廿年复旦校训“密码”

本报记者 张炯强

今天,5月27日,是复旦大学120岁的生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复旦大学建校12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120年来,学校秉持“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追求卓越、开拓创新,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这十个字的复旦校训,究竟有怎样的内涵?120年,两个甲子,复旦大学的精神起源何在,文化底蕴又是什么?

► 今天上午,参加建校120周年大会的学子、校友纷纷在校园里打卡留影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校友说

校训让我一路敢于创先

“亲爱的校友,欢迎回家!”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来自世界各地的复旦校友回归母校,共同纪念复旦百廿相辉。

“从邯郸,枫林再到附属医院,我完成了从本科到医学博士的培养,从一名医学生成长为一名青年医生。”2015届临床医学八年制校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镜中心副主任医师刘歆阳说。在校期间,得益于复旦通识教育和转专业政策,她听从初心召唤,转到了临床医学八年制专业;毕业后,受周平红教授启

发,她进入中山医院内镜中心,投身消化道肿瘤的早诊早治,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向。毕业前,她曾在誓言碑前写下人生目标——做一个让病人感到温暖的医生。“10年过去了,这依然是我朴素理想。”

动物实验课上满校园挖蚯蚓、野外实习期间跟着老师研究蝙蝠饮食习惯……“钟扬老师说,科学不仅是论文和实验,更是用技术解读生命复杂系统的勇气。所以我在本科论文就尝试用NLP分析数百篇文献,构建了基因调控网络知识

图谱。”

在校期间经历的点点滴滴,让2005届生命科学学院本科学友、予果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夏涵至今依旧历历在目。毕业后,怀着“让病原诊断更简单”的使命,他创立企业,开发的产品可快速分析锁定病因,完成42万次病原检测,帮助全球患者重燃希望。回顾毕业20年的历程,他感慨:“正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让我一路敢于创先,让中国的创新走向世界,守护更多生命。”

忆往昔

段段佳话践行守护校训

120年,无数复旦人守护着这十个字的校训。

新中国成立之初从西方发达国家留学归国的复旦教师有21人,其中就包括知名高分子科学家于同隐和后来成为复旦校长的顶尖物理学家谢希德。谢希德和曹天钦以赴英国结婚为由,才得以离开美国,1952年8月,谢希德乘“广州号”客轮从英国南安普顿港启程,最终于10月1日到达上海。她曾在日记中写道“我要振翅飞回祖国故园,去耕耘、去奋斗”“身后的日不落帝国虽有种种诱人条件,却留不住我们的赤子之心”。在谢希德带领下,复旦大学的半导体技术获重要突破。我国第一支锗集成电路、上海第一支锗三极管、第一块锗单晶、调频调场式顺磁共振波谱仪等在复旦研制成功。

在培养人才方面,苏步青老校长为所有复旦人作出了榜样。他提出了“严师出高徒,高徒出名师”,鼓励学生超过自己的老师。他一生培养了谷超豪、胡和生等多位院士,谷超

豪又培养了李大潜、洪家兴等多位院士,形成了“苏步青效应”。2009年,复旦谷超豪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奖后,谷老专门给中央写信,强调数学研究对于国家科技发展的基础战略地位,提议建设“南方数学研究中心”。2012年,由此提议设立的上海数学中心正式揭牌并奠基。

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在生命最后时光“哪怕看不见了”仍每天工作,留下两大憾事:一件事是完成《老子》简注工作,另一件事是马王堆帛书残片的缀合。临终前他还在说,“马王堆帛书的整理工作,可以说是永无止境的,现在还有很多碎片没有缀合上去。”他带领团队在充分吸纳新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对这批文献资料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于2024年出版了集大成之作——《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修订本)》。

复旦1991级国际政治系校友马骅曾是复旦诗社的中坚力量。2003年,他毅然放弃了优越的城市生活,只身来到梅里雪山脚下的藏区明永小学,一边支教、一边从事学术研

究。他将自己的稿费用于学校建设,用爱心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在当地不幸遇难的他用生命谱写了一曲青年志愿者献身教育、忘我付出的伟大颂歌。

校友们还留下了一段佳话:1979年7月11日,复旦大学新闻系7813班同学陶维佳、刘晓红、陈静溪、王晓望结伴游黄山时偶遇邓小平同志。四人商量,代表所有恢复高考后有机会读大学的78级同学谢谢他。最终,王晓望一行在百步云梯附近见到了邓小平,小平同志欣然同意在每人的学生证上签名留念。他亲自指定以“百步云梯”为背景,与大家合影留念。

80年代,师生们求知若渴、争分夺秒,要“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灯火通明、座无虚席的图书馆,草地上围坐讨论的师生是当时复旦园最常见的景象。从复旦话剧团排演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全市轰动,到学生卢新华发表短篇小说《伤痕》在全国文坛引发强烈反响,复旦的文化影响力辐射全国。

看今朝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今天的复旦,人才集聚,群星闪耀,正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校长金力领衔的人类表型组计划,已使中国在这个基础科研领域奠定引领优势。蚂蚁集团原首席AI科学家漆远以复旦大学浩清特聘教授身份开启新征程。作为复旦大学人工智能创新与产业研究院创始院长,在学校大力支持下,漆远牵头启动了CFFF(Computing for the Future at Fudan)的建设,与阿里云、中国电信等合作伙伴共同攻坚国内高校最大的云上智算平台。不久前,通过AI for Science科研范式变革,

复旦一项重磅突破,正为瘫痪者带来新的希望——该校科研团队全球首创的“三合一”脑脊接口技术,将为全球2000万瘫痪者带来新的希望……

为打造基础研究的前沿重镇和全球英才的学术殿堂,复旦大学还成立了相辉研究院。研究院营造最宽松的学术环境,聚焦攻关前瞻性、挑战性、高价值的关键科学难题,提供10年以上的长周期支持和个性化、人性化服务,5—10年不考核,为人才“十年磨一剑”提供制度保障,让研究者心无旁骛、自由探索。就在昨天,张江复旦国际创新中心启新,开启校地合作

共建协同创新育人平台新征程。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化学与材料学院教授赵东元表示,“不要总是问‘有什么用’。”基础研究要破题,首先要突破的,就是“功利心”。他曾说道,“相辉研究院将引育一批具备打破常规和逻辑思维定式,摒弃功利、勇于探索,敢闯‘无人区’的顶尖人才,让他们在充满激情、氛围宽松的学术圣地中探索,从而涌现出具有全球重大影响、作出造福人类新贡献的‘大师级’人物。”这一席话,是对“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进一步演化。

最新开放的“复旦源”内,有一面报墙。《申报》,这份创刊于1872年的中国新闻史早期著名报纸,见证了1949年前的“复旦时刻”。

《申报》1905年刊出复旦的新闻:“每年筹款‘一万金’助马相伯办复旦”。这一年,教育家马相伯创办了复旦公学,他以超前的理念,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要创办“能与欧美顶尖大学比肩”的中国大学。然而,“中国人办自己的大学”,钱从何处来?早在1905年3月,知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就曾公开表示复旦公学是中国人自办的学堂,他责无旁贷。后来的《张謇日记》里对资助复旦公学的记载——“资助一万银元”。其后,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周馥请求清政府再拨款的一万两白银,加上严复等社会贤达公开募集的资金,复旦公学终于得以开办。

复旦公学培养出了一批影响深远的教育家、科学家、政治家,除了于右任、邵力子等人外,还有如中央大学和清华大学老校长罗家伦、浙江大学老校长竺可桢、民革中央原副主委孙越崎等,成为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1920年12月19日,《申报》在第10版刊登新闻:“复旦大学新校舍行奠基礼。复旦大学自经董事会议决募款建筑校舍后,积极进行。校长李登辉君复亲至南洋募捐,经各埠侨商热心捐助,已有成数。复由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昆仲独捐巨款,故进行益速。从岁起陆续在江湾购地七十余亩,并依原有计画(划)先建大学部,于昨日束请各界行奠基礼。下午三时开会,校长李登辉报告,略谓:国家之强盛,可以大学之多少为比例。英美地小于中国,而大学之设,中国瞠乎其远,是非一致进行不可。并谓复旦为私立大学之首创者,以后愿努力成一中国之模范云。”

1913年1月,校董会推举原教务长李登辉出任校长,这是复旦历史上继马相伯之后又一位最为关键的奠基

《申报》的「复旦时刻」

人。李登辉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复旦的创建。临危受命担任校长的他多次赴南洋筹款,募得巨资,购买了江湾校址的土地,也就是现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的一部分,使学校有了立足发展的根基。李登辉在奠基典礼上的讲话,反映出“教育救国”的理念。

1932年6月27日,《申报》第15版刊载:“方一二八祸变之初,复旦义勇军,义愤填膺,星夜奔投翁旅长,请缨杀贼。更鼓吹十九路军主战,得该军同心协力,屡挫敌锋。卒以众寡悬殊,退守安亭,作背城一战。忽以和约协定,素志未伸,忍痛而归。本校师生,举行欢迎大会慰劳之。感赋四绝。”

“一·二八”淞沪战役期间,复旦学子积极投身十九路军抗战。当时,活跃着一支学生抗日义勇军,其中五十余人来自复旦大学生军。他们主要承担后勤保障、抗战宣传和战地教育等工作。报纸上的照片、展柜中的徽章,是这段历史的真实见证。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申报》1937年10月12日第4版刊发时任复旦教员的陈望道的专论《战时的专门教育》。后来曾担任复旦25年校长的陈望道在文中说:“教育所最需要的,是图书仪器,不是高楼大厦。有高楼大厦而图书仪器不够,或者会使人有是办房子、不是办教育之感。有图书仪器而没有高楼大厦,不但可作战时的象征,如果能够就势启发学生安俭乐楼,就连校屋也可以算是一种战时的课程。太过在门面上装璜,形同百货商店,本不是我们教育上非苦守坚持不可的优点。”

从1905年9月到1949年5月,复旦大学历届毕业生共计9000余人。其中,出任大学校长者28人;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或评议员者7人,在81名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占比近一成;后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或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级教授者15人。同时,涌现出革命烈士41人。 本报记者 张炯强